

生在与西方的碰撞。更确切地说，是从16世纪末，利玛竇（Matteo Ricci）、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开始。随着他们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华世界观/文明观发生碰撞，东亚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然而，这些变化是非常艰难和缓慢的。丹斋申采浩在《地动说的效力》一文中，曾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即有关金玉均、朴英镐、徐光范等日后掀起甲申政变的革新派核心人物第一次去北村访问燕严朴趾源的孙子——曾是他们精神教父的朴珪寿的一幕：

朴珪寿珪从壁柜里拿出一个地球仪给金玉均看。这地球仪是朴珪寿的祖父燕岩先生去北京时买的。朴珪寿边转动地球仪边回头问金玉均：“当今中国在哪里？假如这样转过来，美洲就成了中国，而这样转过去，朝鲜就成了中国，所以，任何国家只要到了中间就可以成为中国。那么，当今的中国又在哪儿呢？”金玉均说道（……）位于大地中央的国家是中国，（……）四夷皆被崇尚中国的思想所束缚，才未敢想象叫嚣国家独立。金玉均听朴奎秀一番所言，如醍醐灌顶。^[2]

金玉均和朴奎秀的见面发生在丙子胡乱之后的二百三十年以后，也就是说，他们的见面距离1644年昭显世子跟随入关清军到北京多次拜访汤若望、与他交谈，并从他手中获赠天球仪、闹钟等礼物之时，已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了。而上述历史也说明了，即便如此，十九世纪末的韩国知识分子仍然沉迷于中华思想。

利玛竇、汤若望等人所主张的“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圆的，中国的对面是非洲的好望角。”一说，尽管已是考虑了中华思想在内的中规中矩的表达，但还是给韩国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冲击。因为两国知识分子一直坚信《周礼》的〈大司徒〉中所说的“世界地理中心是洛邑”。当时已经形成一种伦理信仰：周公所建的洛邑乃吉祥之地，堪称宇宙中心；因此，在被称为“中州”的那个地方，一定会诞生世界上独一无二、光辉灿烂的文化。所以利玛竇的观点始终无法得到认可。中国的杨光先曾如下文般激烈批判了汤若望绘制的世界地图，并展开了一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这也印证了上述事实。

因午丑上下之位推之，則大地如毯，足心相踏之說，益令人傷焉心，午陽在上，丑陰在下，明謂我中夏是彼西洋脚低所踰之國，其輕賤我中夏，甚已。（楊光先，『不得已』，卷下，「孽景」）

但是，如果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那么认为洛邑是中心的中华文明观和世界观就会出现問題。另外，如果在圆的地球上中国的对立面是西方，那么也可以看做中国在西方的下面。这种观念触犯了中国与韩国的知识分子敏感的自尊心，杨光先正是利用这样的政治观念，将汤若望送进了监狱。

利玛竇将西方的世界地图介绍到中国，除了宣传有关地球面貌的科学知识和真相之外，也隐藏着试图修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华思想和优越意识的目的。因为不改变这种想法，就很难传播基督教。通过修正“天圆地方，其中心是中国”的观念，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文明也具有仅次于中华文明的价值的这一观念。也就是